

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性人物透视“爵士时代”女性价值观^①

张 勤

(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塑造出3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教养、性格气质迥异却具有依附男人而生活、靠男人的追逐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共同特质的女性人物。这种特质表明了这些女性人物的生活模式以及意识领域中的腐朽寄生性,折射出“爵士时代”的女性心理结构及伦理规范。

关键词:女性价值观;社会阶层;爵士时代;寄生性;虚幻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03)04-0080-05

作为“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的代表作家之一和“爵士时代”(Jazz Age)的桂冠诗人,斯各特·菲茨杰拉德因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25)的出版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菲茨杰拉德是美国文化与“美国梦”孕育出来的作家,也是一个最擅长写“美国梦”,被“美国梦”造就成的时代宠儿。他本人在创作上一举成名后娶了妻子姗尔达。婚后夫妇俩驰骋于美国的中上层社会中,他们狂歌纵乐,生活奢侈豪华,挥金如土,享受着金钱带来的一切。正因为他以这样放纵的姿态,投入到那种生活,他才能够栩栩如生地抒写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生活气息和感情节奏。菲茨杰拉德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的分裂以及隐藏在表面浮华迹象下的危机的感受,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通过3个女性人物的性格塑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可以说他一方面参与了那个时代的酒食征逐,另一方面又冷眼旁观地忠实记录了“美国梦”隐藏的悲哀和幻灭,用他那辛辣讽刺的笔触揭示了那个社会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自私自利、冷酷无情以及最终揭示“美国梦”的虚幻这一深刻的主题。像他作品中的主人公盖茨比一样,菲茨杰拉德一生都在追求那带有玫瑰色的“美国梦”,追逐意味着成功的金钱。而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他又深深地体会到物质奋斗和享乐主义的毁灭作用。正是他对这个时代狂热的追求与深刻的批判,使他的这部小说表现出了带有悲剧性的时代幻灭感,而被认为是美国20年代“美国梦”幻灭的一首绝唱。

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细腻而又准确地描绘了“爵士时代”的众生相,尤为令人难忘的是3个重要的女性形象:盖茨比的梦中情人、名门闺秀黛西·布坎南;黛西的女友、高尔夫球球手乔丹·贝克及汤姆·布坎南的情妇莱特尔·威尔逊。3位女性出自不同社会阶层,性格气质迥异,但却具共同的特质,即本身已丧失社会独立性,靠紧紧地依附男人而生活,靠男人的性爱与追逐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从对男性的依附中所得到的奢糜迷乱的享乐生活来证明自己的生存意义。如乔丹·贝克这位对人间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的女人所言,“世界上只有追求者和被追求者,忙碌者和休闲者。”^{[1](P107)}而造成这些女性生活的腐朽和寄生性的价值观的,我们认为,正是她们所生活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这个“喧嚣的”(roaring)爵士时代最终只可能造就出这样一群没有头脑、抛弃理想、赤裸裸地追求财富、追求享乐、依附权贵的女人,她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折射出“爵士时代”的女性心理结构及伦理规范。文章从社会学批评的角度,就小说中3个女性人物性格塑造进行分析,认为她们分别代表3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黛西——上层阶层;乔丹——中产阶级;莱特尔——小资产下层阶层,然而却具有“爵士时代”女性价值观的共同特征:抛弃传统的“真女性”的社会模式即“虔诚、贞洁、温顺、

① 收稿日期:2003-02-10

作者简介:张勤(1957—),男,湖北武汉人,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持家”四种品质,去追寻一种“品尝狂热的物质生活”,即带着一种矫枉过正的心理,抛弃过去人们所珍视的富兰克林式的社会价值标准,把物质财富视为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如书中所描摹的盖茨比奢侈的家庭舞会、豪华的别墅和“怪物”般的大轿车都是身份的象征,就连那富丽华贵的进口衬衫都可使黛西瞠目结舌,为之动容。正如一位美国文学评论家所言:“菲茨杰拉德年轻时曾迷恋过金钱,但成名后又挥霍无度,深受金钱的毒害,因此他对金钱的价值有着很深的理解,并能够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一个上流社会的‘金钱罗曼史’。”^[2]诚然,菲氏在以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在书中着力表现这种美国悲剧和时代悲剧。

黛西:被哀怨的喇叭吹落在舞池里的玫瑰花瓣

黛西的少女时代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炮火湮灭了人们的美妙幻想,人们失去了一切支撑点,一切理性的知识及信仰都崩溃了。美国传统价值观的破灭,沉沦了迷惘的青年一代。迷惘之中,黛西及其同代女孩彷徨长大,她们活跃于各种社交界,出没于灯红酒绿的社交舞会,终日踟躅在理想化的“荒原上”。正如菲氏在他的小说《尘世乐园》(This Side of Paradise)中叙写的这个“爵士时代”女孩子的生活那样:“凡是有着维多利亚时代脑筋(母亲们大都有这种脑筋)都懵然不知她们的女儿是被人吻惯了。‘名媛’变成了‘卖弄风情的女子’,‘卖弄风情的女子’又变成了‘小妖姬’。”^[3]在此背景下,黛西与无财无地位的盖茨比的相识相爱是断然无结果的,其必然性也是迎合“爵士时代”女性价值观的。由于她是一个只重钱财而无价值的人,她将自己的生活理想寄托在物质利益上,所以她代表的只能是虚幻、无价值之物,而绝非幸福和爱情。

在迷惘中,黛西也曾奋力挣扎过。盖茨比在向尼克描述他与黛西的爱情时说过:“有一阵我甚至希望她把我甩掉,但她没有,因为她也爱我。她认为我懂很多事,因为我懂的和她想的不一样。”^{[1] (P115)}黛西对生活观念的混乱感到过苦闷,对纸醉金迷的生活并非始终向往,这在参加盖茨比的舞会上有所描述“她四处张望了一下,对我(尼克)说那个女孩俗气可是漂亮,于是我明白,除了她单独跟盖茨比待在一起的半小时外,她玩得并不开心。”^{[1] (P143)}在这种无法摆脱的空虚苦闷中,黛西在下意识地寻找一个精神上的依托。因为她自身不具备走出摆脱困惑的力量,而盖茨比似乎又正好充当这个角色。对她来说,盖茨比所懂的那些“和她想的不一样”的东西是一份朦胧的希望,虽然她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它却引导着她憧憬这一个新奇却陌生的精神园地。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她也曾是一个有过纯洁梦想的少女及她最初与盖茨比的真诚相爱。但是,尽管如此,“在上流社会通宵呜咽着的《比尔街爵士乐》绝望的哀吟中,在低而甜腻的狂热的震颤”中,^{[1] (P73)}黛西找不到可支撑她的希望的力量,她深深地感到这份希望的渺茫及虚幻,她需要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向她保证,而盖茨比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无法给她安全感。此时的她是一个软弱且迷惘的女性,她不知道自己追寻什么,也没有勇气去寻找去付出。物质的诱惑令她那少女虚荣的心不安地骚动着,致使那朦胧的希望泡沫似的破灭后她选择了“一股近在眼前的力量”来填补这份失落,来把“本能的发泄由生物性转移到社会及现实中去,使之得到一种补偿”,^[4]这就是与汤姆·布坎南的结合。此时,“她那美丽的面容露出自鸣得意的笑容,好像在说,她如今已和汤姆同属上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某一秘密团体中的成员了。”^{[1] (P25)}

同盖茨比的分手到与汤姆的结合宣告了黛西梦幻时代的结束。此刻的她,由一个天真的少女转化为上流社会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物质至上主义者。黛西的转变反映出了“爵士时代”的女性在人生价值观上趋于从追求享乐到虚无到颓废主义的内在契合。她选择了汤姆,终日沉湎于节奏欢快的“爵士乐”中,出没于各式社会沙龙,这就是选择了与金钱社会的融合。但身为布坎南太太的黛西,生活得却并不如意,她凭藉这份婚姻满足了自己对财富、地位的需求,但短暂的满足过后,她的内心很快又被空虚、茫然重新占据。她麻木地享受着这种“幸福”,但宛若饮鸩止渴一般。这使得她愈加麻木,而这种麻木正是她身份和个性丧失的反应和必然结果。与汤姆·布坎南的婚姻是美貌与财富的结合,其间本无真情实爱可言,物质上的满足更不能代替精神的充实。可她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上流社会的高贵优雅之态。作为叙事者及故事参与者出现的尼克的眼睛尤如一架高度逼真的摄影机,随着背景徐徐拉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仿佛飘浮于半空中的梦幻舞台。黛西带着表演的痕迹矫情作态,刻意追求一种在她设计下的效果,企图掩饰自身的空洞无物。此时的她,用女友乔丹的话来说,就是生活里需要一点“安慰”。而盖茨比又一次适时地出现了,重要的是他不仅还保持着当初打开黛西少女心扉的理想主义气质,并且还拥有从前所不具备的巨大财富。财富对盖茨比来说,是他的梦想得以实现的足以点石成金的神奇魔杖,而对黛西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少女时期的梦想在她的视角镜子里变形与变质后再一次重现。为利所驱动的她再次投入盖茨比的怀抱。此时的盖茨比只是她的一种利用,是冷漠的现实生活外的“慰藉”。盖茨比痴迷执著的爱再次证明了她个人魅力所在,这令她暗自为荣,她需要这份爱来填补丈夫的背叛所带来的伤害与空虚。而此时的盖茨比并没能理解黛西的变化。他的爱毕竟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不是少女时代的黛西,而是他脑

海里的黛西的再塑造,是一个理想化的梦,这与黛西少女时期的“希冀”是一致的,不同的是,5年后的黛西已完成了从“梦幻”到现实的转换过程;而盖茨比则仍滞留在梦中。这种矛盾的对比导致了盖茨比的悲剧不可避免。于是,在这萎靡的精神荒原中,黛西把迷留在梦中的盖茨比一步步引向“死亡”。与金钱社会融合后的黛西成了丈夫的翻版与附庸,在道德沦丧、个性丧失中她变得冷漠无情、自私自利,投向盖茨比的怀抱只是想利用他寻求一份短暂的精神安慰。于是当盖茨比的“骑士风范”在汤姆“铁硬的恶意下”被无情地揭下时,她惊惶万分,在危险降临时她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盖茨比,并选择他充当了自己罪恶的牺牲品。

黛西由一个梦幻少女到与金钱社会的融合再到成为这个物质至上的社会的邪恶时风的代表这一过程,是菲氏笔下“爵士时代”的上流社会女性心理成长历程的真实写照。用菲氏的一个生动比喻来说,黛西是“一朵被哀怨的喇叭吹落在舞池里的玫瑰花瓣”,^{[1] (P203)}她最初的娇美、艳丽在缺乏精神观念的奢靡生活中逐渐褪色变黯以致最后成为害人夺命的工具。她的整个心理历程的格调是低落的,缺乏真正的激情与活力,只是无力地在金钱的叮当声中随波逐流,挥霍自己的美丽。她一味地屈从于各种诱惑,既不能也没想过去认清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她的美丽芳香是醉人的,但充满了世俗的味道及罪恶。在盖茨比的梦想被无情的现实碾碎后,有这样一段描述:“他一定透过可怕的树叶仰视过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发觉一朵玫瑰花是多么丑恶的东西,阳光照在刚刚露头的小草上是多么残酷。”^{[1] (P216)}树叶间的天空、玫瑰花、阳光照在刚露头的小草上,这都是些何其美妙的意象,但在叙事者的镜像中它们给人的心理观感却完全两样;美而格外可怕,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物质的然而并不真实”,^{[1] (P217)}在这里,美好的东西却蕴藏着巨大的毁灭性。黛西是美丽的,她优雅动人,好似一朵甜美的诱惑的玫瑰,却充满了丑恶,她属于典型的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女性:“外表可爱娇媚,浪漫却有寄生性,且情感冷漠可怖。”^{[5] (P116)}

无疑,黛西也是“美国梦”的象征。她美丽迷人,却又毫无价值,在爱情和金钱之间她选择的是后者。盖茨比以虚妄的她作为理想的化身表现了他的理想是建立在金钱能够实现的梦想的基础上。

乔丹: 潜心上上的中产阶级女性

在读者眼中,乔丹·贝克是一个漫不经心、对什么都不会特别在乎的女性。如果用颜色这一文化编码意义来展示人的性格特征,黛西是玫瑰的深红,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乔丹则是菊花的淡黄。在她无所谓的面孔之下,掩藏着对金钱、名利的追逐。

聪明的乔丹,很清楚自己在何时应扮演何种角色,她用一副傲慢、清高的面孔掩饰着自己的心机。与黛西的风情万种不同,她是在不动声色中靠心机去获取所需。16岁时,她将黛西当作所有年纪比她大的女孩中最大的崇拜者,因为黛西拥有她所不及的财富和地位,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小姐当中最出风头的一个人”。^{[1] (P58)}其实她对黛西的崇拜是对金钱名利的崇拜,是她物质至上及虚荣心理的真实反映。黛西对乔丹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她成年之后,这从书中不少地方可以看出,当乔丹出场时,她与黛西“如同一个大气球在空间悬浮,她们身着白衣裙,那雪白的薄纱在风中飘舞”^{[1] (P8)};同盖茨比、尼克一起拜访黛西时,黛西的女儿说了一句:“乔丹阿姨也穿了件白衣裳。”^{[1] (P90)}当乔丹回忆黛西的少女时代时,她特意提到过“她(黛西)穿的是白衣裳,开的是辆白色跑车。”^{[1] (P58)}这种白色的编码意义是纯洁高贵与丑陋卑贱、善与恶的集合体,它介于是与非、虚与实之间,表达出菲氏笔下的女性患得患失的飘渺感,也表达出了黛西对乔丹的深刻影响,换言之,黛西的生活是乔丹所向往、追求的目标。然而,在与黛西的交往中,她又不自觉地感受到一种压抑与自卑——这是在反衬于黛西那天生的优越感下产生的。乔丹也有美丽的容貌,但却缺少黛西那种对男性几乎是不可抗拒的魅力,在财富、地位上她也比不上黛西。高尔夫球选手的运动生涯,让她深切体会到竞争的激烈与残酷。在这种竞争中,她不得不择手段、铤而走险,用不光彩的手段去夺取胜利。她比黛西这朵温室的玫瑰要“老成”得多,“不会把早已忘怀的梦一年又一年地还藏在心里”。^{[1] (P92)}她能够直奔目标,而少了许多黛西特有的扮演出来的那份感性与缠绵。故而,乔丹从一开始就是个很现实的人物。其现实也表现于她对男性的态度上。对于她和尼克的“爱情”,评论家斯坦雷·库珀曼(Stanley Cooperman)有过精辟的论述:“乔丹感觉到了尼克内心深处的诚实和道德坚贞(尼克代表了那注重‘品行’和道德责任感的老传统,正如同盖茨比代表了一个由道德变质和虚假梦想组成的新世界),于是她意识到只有同尼克这样的人在一起,她才能够‘走自己的路’;尼克肯定会时刻跟在后面收拾她留下的烂摊子的。总之,对乔丹·贝克来说,她对尼克的‘爱情’只不过是她众多算计中的又一次罢了。”^{[5] (P99)}

在这个精神家园到处是断垣残壁的年代,乔丹学会了“对世间的一切都抱怀疑态度”,因此她的行动处处都打上了利己主义的烙印。她只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去付出和攫取,决不做任何在她看来无意义的事。她十分小心地保护自己,不顾自己应尽的责任;因为“责任”是别人的事,只有“需要”才是自己的,别人都必须为她的利益让路。所以,在尼克离开她

时,她感到深受打击。为了在精神上达到平衡,她甚至告诉尼克,她已与他人订婚,以此来在心理上扭转自己的“不利”。她并不在乎失去尼克,而是愤然于尼克“甩”了她,而不是她抛弃了他。被扭曲的心灵已无能力去爱一个人。

我们将乔丹喻为是“淡黄色”色泽,一方面是出于乔丹惯以她那“轻藐”的“嫣然一笑”搏取男子的怜爱,以掩盖内心的冷漠无情,利用男性赚取自己的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是乔丹与黛西“充满了金钱”的声音一样,其笑容下也藏着对金钱的渴望与追逐。在“爵士时代”的大舞台上,乔丹中产阶级的出身使她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她渴望向上流社会迈入,但在心理上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一种由于担心被这个令她心醉的社会所排斥的隐隐恐惧与自卑时时攫住了她,使她选择了一副“傲慢的面孔”来保护自己,因而,在许多方面,她显得比黛西要老于世故,要有力得多。在“爵士时代”的舞台上,可以说,乔丹·贝克将中产阶级女性的心理演绎得淋漓尽致。

茉特尔:嗜利者与殉葬品

居于社会底层的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茉特尔·威尔逊在这部小说中扮演的是个近似于小丑的角色。作为一个贫困的车行老板的太太,茉特尔显然丧失了对传统的良莠之分、源流之别,她脱离了自己隶属的文化土壤、文化之根。她对于自己的丈夫一味地刻薄嘲讽与奴役,认为自己“干的唯一发疯的事是跟他(威尔逊)结了婚”,而他“连舔我的鞋都不配”,^{[1] (P106)}俨然一副势利小人的嘴脸。她冷漠无情,丝毫没有将丈夫对她的深情厚爱放在心上。无疑这样一个粗俗浅陋、装腔作势、滑稽可笑的女人,与表面美丽优雅的黛西无法相比。汤姆对她的“追求”(其实追求都谈不上,两人不过是不知廉耻的一拍即合而已)不过是像一个吃惯精细饮食的贵族,偶尔换换口味,尝一下民间粗食把她当作玩偶而已。这从他对待她的态度可窥出一斑。当茉特尔对黛西直呼其名时,汤姆沉下脸认为她不配,并动手打了她。这并非是酒醉之举,而是他认为她是一个“下等人”,无权平行于黛西。“毫无疑问,一个自我属于一种具体的文化环境,尽管它说的是一种母语:一个自我,一种文化和一种语言。”^[9]茉特尔的自我意识已颠倒错位。在她这里,汤姆所代表的上层社会的男性菲勒司中心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茉特尔对汤姆,纯粹是出于贪慕虚荣的心理。在她与汤姆邂逅相逢时,仅因他“穿了一身礼服,一双漆皮鞋”,就禁不住“老是看他”,为他“神魂颠倒”,她爱上的实则是汤姆代表的颓靡生活及对她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上等人”身份——而这是深爱但却无法满足她的丈夫所不能给予的。为此,她怨恨他,无情地背叛他,将他视为一个“傻瓜”。她投入汤姆的怀抱,并仿效上流社会举办一些小型聚会,以炫耀她的“幸福”,她附庸风雅,矫揉造作,但却使她显得更加无知可笑。她妄图通过汤姆攀附上流社会,但汤姆只是将她视为玩物而已,他决不会容许她逾越自己的“身份”,所以,她只能成为一个金钱与势力的殉葬品。对于黛西来说,茉特尔的存在不过意味着“汤姆在纽约有一个女人”,她并无意于了解这个女人,因为她知道,这个女人对于她所拥有的一切——钱财地位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而对茉特尔来说,黛西的存在是阻碍她实现“理想”的最大障碍,以至她不顾一切地冲上公路,要拦下黛西的小车,扫除这个“冤家”,也正是这个“逾越本份”的举动使她命丧黄泉。

茉特尔所生活的阶层使她对优越于她的上流社会女性存在着一种出自本能的敌意,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她又时刻想过上与那些女性同样充满享乐的生活。但那个社会虽然还能容许乔丹·贝克有距离地介入,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纳出身低微的她。茉特尔所走的路,是“爵士时代”下层社会女性想要进入上流社会的悲剧性选择;她们自轻自贱,被人当作玩物还自鸣得意,不甘于低俗的命运却充斥着低俗的举动,她们明白,在这个时代,诚实劳动勤俭持家很难给她们带来尊严和幸福。所以她们就抛弃美国拓殖时代的优秀传统,抛弃自己的文化之根,脱离自己隶属文化的土壤,走向精神虚无与飘零之中;宁愿委身于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也不愿再做任何追求真正幸福的努力。茉特尔的命运告知人们,由于缺少精神上的依托,以纯粹的物质追求为内容的“美国梦”已经蜕变成了一种极具腐蚀性的东西,使人误认为只要达到物质的满足就能达到生活的满足,而追逐这样的梦想只会再一次将自己将他人推下理想破灭的万丈深渊。这也是“美国梦”破灭的真实写照。

最后的叩问:女性价值观的沦丧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这3个女性人物本质中的共同点是:贪慕虚荣、冷漠无情却又醉心于对金钱与享乐的追求——而这又只能靠依附男性来达到。这种女性价值观的形成与时代的精神、道德氛围是一脉相承的。由于乔丹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女性和茉特尔所代表的下层女性都是受着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熏陶和诱惑,让我们把视点再转到黛西身上做进一步思考。

黛西在她的“梦中的小宝贝”出世时说过,“好吧,我很高兴是个女孩。并且我希望她将来是个傻瓜——这就是女孩

子在这种世界上最好的出路, 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1] (P15)} 这话是黛西对自己也是对整个女性命运的无奈的叹息。自轻自贱的亲身经历使她深切地体会到, 女性美丽的容貌是吸引男性而获取自己意欲得到之物的有效手段, 而敏感聪颖则是心灵痛苦的根源。在男子的追逐中, 在奢糜的金钱生活中, 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同样身为女性, 乔丹也因为黛西为众男性追逐而格外崇拜她, 社会的影响加上个人的经历, 使她不得不更加充分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这份筹码, 通过取悦、取怜于男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正是女性自身价值的倒错与缺失, 她们的迷惘虚无则揭示出作者对资产阶级价值标准的怀疑。”^[7]

黛西的身上, 诚然有着菲氏的妻子珊尔达的影子。菲氏的婚姻恰同于盖茨比与黛西的情感跌宕历程。珊尔达在与菲氏相爱后, 也曾因菲氏的贫穷而离开过他。其现实生活中珊尔达是十分有才华的, 她也并非是一个徒有美貌的浅薄女子。但是, 在社会化的声浪中, 女性的才华也不过如美貌一样, 仅略为“提高了她们的身价而已”。就连尼克, 尽管乔丹的名气最初也令他能以相陪她而感“荣幸”, 心底下也从未将她视为一个平等的“人”。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是与经济上的附属地位不可分割的, 男性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决定了他们特有的社会形态和思维模式, 他们追名逐利, 沉溺于及时行乐与拜金狂热, 自然而然地就把女性沦为自己作乐和作恶的工具。他们需要的女人, 从本质上说, 就是要漂亮的傻瓜和性奴隶。这究竟是为为什么? 为什么在这样的科技昌明的时代, 人性却这般堕落, 以致形成这样陈腐的时风? 这是作为艺术家的菲茨杰拉德向历史向时代发出的叩问。他并未为这些诘问找出合适的答案, 但通过对这3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形象的并置分析, 我们可以预知, 要改变这一切, 女性不仅需要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人”的价值意识的觉醒, 更要以有效的努力去实现与证明这一价值。

参考文献:

- [1] F. S.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M] .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2.
- [2] Malcolm Cowley. *F. S. Fitzgerald—Ranance of Money*[M] . The Viking Press, 1973.
- [3] 威廉范俄康纳. 美国当代七个小说家[M] . 张爱玲等译. 三联书店, 1988. 111.
- [4] 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学史[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98.
- [5] Stanley Coopenman. *F. 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M]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6.
- [6] 张京媛.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55.
- [7] 王宁. 20 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名著导读[M]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23.

Perspective of Female Identity from Three Women Characters in The Great Gatsby

ZHANG Q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women characters in *The Great Gatsby* by F. S. Fitzgerald are characterized equivalently by closely depending on men and realizing their value by the latter's love and pursuit; however, they are from opposite social strata, having deviating educational levels and sharing contrasting temperaments. This projects their value of leading a lavish life and parasitic life, thereby refracting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ethical standard of women in the “Jazz Age”.

Key words: Female Identity; Social Strata; Jazz Age; Parasitism; Illusion

(责任编辑 周芷汀)